

语言类型学视角下英汉表量的认知对比研究

李勇忠, 尹利鹏

(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将英汉表量系统中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个体量词是汉语独特认知观的体现,“数”的范畴标记是英语表量系统的一大特色,英汉表量系统的繁简之间存在辩证关系。通过举例验证英汉表量系统的认知构建机制:转喻—隐喻连续体的互动机制和具身认知机制,旨在为研究表量系统的构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语言类型学; 英汉表量系统; 转喻—隐喻连续体; 具身认知

中图分类号: H3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8)04-0140-05

A Cognitive –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Quantity – presenta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LI Yongzhong, YIN Lip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Theor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quantity – representations. The classifiers are a peculiar Chinese type that reflects Chinese cognitive ideas. And “number – marking” is a key feature of the English classifier system, and there exist some dialectical relation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lassifiers’ structures. In this paper, plenty of examples are given to verify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s of the classifiers’ structures: metonymy – metaphor continuum structure and embodied cognition, aiming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classifiers.

Key words: linguistic typology; English and Chinese classifier structures; metonymy – metaphor continuum; embodied cognition

一、语言类型学

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作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学分支近年来发展迅速,它是一种跨语言结构性的分类研究,主要是根据语音、词法和句法对语言进行分类。^{[1][P13], [2][P1-6]}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人员常从跨语言的研究视角,既可以是不同地域的语言研究,也可以是不同种类的语言研究。研究人员首先搜集大量的语言数据,然后对语料进行共时或历时的对比分析,最后归纳并阐释跨语言背后蕴含的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蕴含共性是类型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揭示不同语言之间关系的切入点。近年来,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倾向于对语言特征背后起制约作用的社会、地域、文化、认知

收稿日期: 2018-0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认知类型学视野下汉英表量结构的对比研究”(编号: 16BYY015); 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汉英表量结构的认知修辞研究”(编号: 15yy02)

作者简介: 李勇忠(1969-),男,江西南康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

尹利鹏(1993-),男,江西吉安人,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

等因素进行探究,并描写和解释不同的语言背后所隐藏的共性和规律。作为当代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语言类型学备受学界重视。^{[3] (P33-41)}

关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最经典的范式当属 Greenberg(1966)对蕴涵(implication)普遍现象的研究,他创建了一套全新的语言分析方法,即“格林伯格方法”(Greenbergian approach)。^{[2] (P1-6)}随之,Croft、Alexandra等学者将类型学理论从分类向解释性质方向发展。^[4-6]而国内学者对语言类型学的关注盛行于21世纪,刘丹青、石毓智、金立鑫、陈勇、李韧之、吴春相等学者对类型学在语言各个层面的应用颇有研究,并积极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汉语的解释与比较之中。^{[2] (P1-9) [7] (P33-37) [8] (P33-41) [9] (P359-372) [10] (P73-77)}

人类的语言具有可比性。在语言类型学中,语言的可比性是确定跨语言语法相似现象的重要前提。^{[4] (P11)}对跨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既能突显语言的独特魅力,又可找寻人类语言共有的特性,甚至可能对某种语言产生新的认识。

二、英汉表量系统的对比

量词是汉藏语系的显著特点之一。汉语作为汉藏语系的一个分支,亦包括量词这一独特的语言范畴。将汉语的量词置于语言类型学视角下,并与英语中的表量结构进行对比分析,这有助于探究二者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以及进一步探索英汉表量认知解机制。

在汉语中,量词主要是作为数量单位用以计量人、事物或动作,凸显计量对象“数、量”的性质。^{[11] (P9)}汉语的量词(classifier)分为两大类:名量词(又称物量词)和动量词。名量词是表现人或事物数目的单位,动量词则表示动作行为的单位。本文所涉及的量词主要是名量词,其作用是对名词进行量化,将无界的事物有界化。量词与名词的基本搭配结构是“数词+量词+名词”。英语的名词本身可根据自身的变化表示事物的数量,英语没有量词这一特殊词类,但它却有类似的表量结构,常见的表量结构是“a+N+of+N”(N表计量名词,N'表计量对象)。为方便比较,本文称英汉两种结构为表量结构,在英汉表量系统中,二者存在一定的共性,但更多的是个性。

(一) 个体量词: 汉语独特的认知观

个体量词是汉语拥有的独特语言范畴,英语没有个体量词,这也是汉语量词异常丰富的原因之一。在英汉表量系统中均包含集体量词,如一群人(a group of people)、一盒烟(a pack of cigarettes)、一束花(a bunch of flowers)等;包含度量衡量词,如一尺布(a meter of cloth)、一寸领土(an inch of territory)、一斤肉(a kilo of meat)等;包含容器量词,如一瓶酒(a bottom of wine)、一桶油(a can of oil)、一罐奶粉(a jar of milk powder)等;包含临时量词,如一货车苹果(a truck of apple)、一屋子人(a roomful of people)等。但汉语中的个体量词,如一颗珍珠、一本书、一只猫等,在英语中直接以冠词a(n)+名词(a pearl, a book, a cat)的形式呈现,并没有特别的表量结构。个体量词又被称为类别分类词(sortal classifiers),它是因适应事物本身的属性而形成的,因此具备一定的定性功能。^{[5] (P32)}与之前几类的量词相比,个体量词虽然没有计数功能,但从性质上来看与名词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后者所体现的是名词具有的认知特征,如在“一条蛇”中,个体量词“条”表明蛇有[+长条状]、[+柔软]、[+可弯曲]的特征。这些显著特征也反映了蛇在人类心理空间中的认知属性。个体量词与名词的接近度高,所以具有很强的预测性,由它可以推断出名词的特性,反之亦然。

(二) “数”的范畴标记: 英语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系统

在表量系统中,“量”与“数”的范畴标记不共现,二者成互补关系。如上所述,在形态上,汉语名词体现事物的属性,不可直接与数词连用,需借助中间成分(量词)这一“量”的范畴标记进行量化。而在英语中,名词分为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这一语言形式可直接体现“数”的特征,无需进一步量化。因此,在显性类型学中,汉语属于“量词型语言”,而英语则属于“数标记型语言”。^{[12] (P1-4)}

对英语可数名词进行量化时,可直接通过形式的变化,即添加词缀“-s”作为复数标志,但对不可数名词进行量化或对名词类别加以区分时,则需采用表量结构,如对“bread, furniture, milk”等不可数名词进行量化时,则应表达为“a piece of bread, an set of furniture, a bucket of milk”。

英汉两种语言在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的表达上不完全对等。汉语的名词无明显的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之分;而在英语中不仅有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之分,而且有些名词还处于两可之间,如“people”“paper”“snow”等既是可数名词又是不可数名词。英汉两种语言的结构和形式体现了特定社会文

化背景下的世界观和认知观。根据“Sapir - Whorf”假说,“语言决定思维”这一推断充分说明人们在对名词可数与不可数概念进行判定时,汉语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的直接感觉,而英语是基于语言形式。^{[13] (P85-87)}

(三) 英汉表量系统繁简辩证关系

汉语以其独特丰富的个体量词著称,而在英语中表量结构的多样性是汉语所无法比拟的,如表示“群”这一集体概念时,汉语中还可使用“帮、批、伙、班、窝”等量词,而在英语中则有诸多表示该集体概念的表量结构,其形式受计量事物属性的影响,如表示人的群体有“a group/ band/ bench of people”,表示动物的群体有“a flock/cloud of birds”(一群鸟),“a pack of owls”(一群猫头鹰),“a(n) colony/army of ants”(一群蚂蚁),“a herd of elephant”(一群象),“an school/shoal of fish”(一群鱼),“a gam of whales”(一群鲸)等。此概念的表量结构还因对计量对象的认知和感情色彩而异,如一群无组织无秩序的人(a crowd of people),一群蜂拥而至的人(a swarm/throng of people),一群生机勃勃的人(a troop of visitors/fans),特指“女性”的一群(a bevy of ladies/young women),一群精英(a galaxy of talents),带有贬义、轻蔑色彩的一群(a mop of blackguard, a horde of swindlers)等。^①

英语表量结构通过多样的集体量词传达人类对计量事物微妙的心理感受,个体量词的缺失使得集体量词非常丰富,这充分体现了语言类型学当中的辩证关系,如果语言的一个要素简单,那么必定有另外一个复杂的要素对其进行补充。^{[13] (P85-87)}

三、英汉表量系统的认知构建理据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语言形式是基于人们的经验方式、认知规律和概念结构所形成的,是人们对世界的具身体验和认知方式的体现。^{[14] (P14)} 表量系统亦是如此,其与人的认知方式和经验结构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而人的认知方式和经验结构会受社会、经济等时代因素的影响,因此,英汉表量系统的演变和发展是具有时代韵味的,亦是有理可循的。

(一) 转喻—隐喻连续体的互动机制

1. 转喻—隐喻相互作用连续体

早在1980年,Lakoff和Johnson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提出,我们可以依据一个经验领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领域,隐喻的实现机制是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15] (P5)} 基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人们注重用自身熟知的、具体的一类事物的属性来理解相对陌生的或抽象的事物的属性。之后,Grady将隐喻分为两类: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和复合隐喻(compound metaphor)。^{[16] (P304)} 基本隐喻是基于人类直接经验和感知所形成的最基本概念之间的简单隐喻,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体验相关性;而复合隐喻是以基本隐喻为基础,将两域中多个具有相似性的概念进行映射。

转喻是认知机制的另一方面,亦是一种概念映射现象,但与隐喻又有不同之处,它是存在于单个认知域中的概念映射。Croft认为转喻是为了凸显一个概念域矩阵(domain matrix)中某个特定的认知域。^{[16] (P315)} 转喻是基于概念之间的邻近性(contiguity),它将两个处于不同层级的概念进行暗含联系。转喻在语言的认知解操作方面与上文提及的基本隐喻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是基于对世界的直接体验。因此,隐喻和转喻存在一定的联系。

隐喻和转喻的相互关系已被学者们所证实。二者都是通过概念映射产生新显结构,隐喻的映射以转喻映射为前提,许多概念隐喻源自概念转喻,部分概念隐喻包含概念转喻,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转喻—隐喻连续体。我们认为,在这一连续体中,转喻和隐喻的相互作用为表量结构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认知理据。

2. 英汉表量系统中转喻—隐喻连续体的互动机制

汉语量词是在名词、动词等基本词类形成之后出现的。^{[17] (P1-5)} 表量结构主要来源于各类名词和动词的语法化。在该语法化的过程中,转喻—隐喻连续体的互动机制起了主要的作用。唯有通过这一互动机制才能实现由名词、动词向量词词性的转变。

① 参见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b8be2d71a417866fb84a8e92.html>。

隐喻的映射来源于转喻,并以转喻映射为先决条件。如量词“根”,在《说文解字》中其被释义为“根,木株也。”作为名词,其为植物之“整体”的重要“部分”,在人们对树木这一概念识解中较为凸显。当人脑中“根”的概念被激活之时,人对“根”的整体认知立刻会被相应地激活。“根”最初语法化为量词,通过“部分—整体”的关系触发转喻机制,用以计量树木等植物,如“一根树枝”“一根藤条”等。再者“根”具有条状的属性,因此可用于量化条状物,如“一根竹竿”“一根筷子”“一根灯芯”等,^①在这一层面上,“根”量化范围的扩散是基于相似性的隐喻映射。有关其另一层面的隐喻映射有“根”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而人与动物的毛发也是从皮肤里生长出来的,根据二者的相似性,“根”又可量化非植物之物体,如“一根胡须”“一根头发”“一根羽毛”等。

在语法化的过程中,通过转喻操作,“根”可以凭借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借代“树”当中的某些属性,为隐喻提供可进行类比的相似性特征,使得语法化程度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范畴体系,中心成员是具有[+长条状]、[+细长]属性的物体,之后再不断扩展。所量化的事物可扩展到“一根稻草”“一根竹子”“一根秸秆”等草木类,还可扩展到“一根面条”“一根针”“一根蜡烛”“一根油条”等生活用品类。这一认知过程亦可说明量词的演变和发展是转喻生成隐喻扩散的一个过程。

再如量词“枝”,其本义为树木主干或大枝上长出的细枝条。在其量化的过程中,人们根据其“部分—整体”的转喻认知机制,用“枝”指代整体,如“竹外桃花三两枝”“一枝玫瑰”等,之后通过相似性的概念隐喻将其量化的范围扩散至杆状的事物,同“支”,如“一枝步枪”“一枝毛笔”“一枝蜡烛”等。

在隐喻扩散的演变过程中,量词语法化通常是从量化具体事物转变为量化抽象事物,由有形物体的量化扩散到无形物体的量化。“股”原为名词,指人体胯至脚腕的部分。在宋元时期,人们将其范畴化,然后进一步语法化为量词,用以计量呈条状的事物,如“一股泉”等。明清时期,其计量对象的范围有所扩大,可以量化水、烟、气等抽象的、长条状的事物,如“一股水”“一股仙气”“一股恶烟”“一股火星子”等。直至现代,人们将“股”这一量词计量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可量化“气味、力气、勇气、情绪”等无形事物,如“一股寒香”“一股势头不小的压力”“一股豪气冲天”“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等。由此化无界为有界,量无形于有形,使人们在认知识解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更耐人寻味。

在英语表量系统中,虽然没有明显的转喻—隐喻连续体的互动机制,但转喻和隐喻机制在表量结构的语用固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如在“a stream of + N”这一表量结构中,“stream”作名词有“a small narrow river”之意。溪、河流具有[+流动]、[+带状]的属性,将“stream”这一层面的特征与所修饰的名词进行相似性类比,可计量“smoke”“stream”“blood”等流体物,凸显这类名词带状、流动的特征;还可将其与主题物类名词进行隐喻映射,如“a stream of soldiers/immigrants/customers”等。因隐喻的促动作用,该词的概念进一步语法化,计量的范围不断扩展,如之后又赋予其[+不间断]、[+连续性]的属性,形成了“a stream of discoveries/ideas/memories/noise”等量化抽象、无形之物的表量结构。

在表量系统中,有一些固化结构是约定俗成的,其生成机理人们已习焉不察,这类固化用法均存在一定的认知理据。如在表量结构“a flood of + N”中,“flood”作为名词,意为“an overflowing of a large amount of water beyond its normal confines”,给人直接的体验是泛滥成灾的河水。若用来计量水(water),表面上看二者意义有所重复,实际上是运用转喻机制,洪水(flood)将“水”的[+水位高]、[+水量大]认知属性凸显出来,“a flood of water”便有“一片汪洋”之意。“a flood of tears”则将“水”的[+多,不间断]属性与泪水类比,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泪流不止之状。“flood”还可扩展到计量“lights”“boasts”“terror”等抽象事物,将朦胧的事物和情感具体化。

(二) 具身认知机制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是指人的认知受身体经验与感知的影响,注重人自身作为主体在概念形成过程当中的重要性,强调人的具身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是大脑意象图式中基本概念、语义结构形成的基础。认知的具身性认为人类是以体认(embodiment)的方式认知世界、他人和自己。^{[18][P1032-1042]}人作为认知的主体,在认知概念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① 文中部分汉语量词例子主要摘自北京现代汉语语料库,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具身认知机制在英汉表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认知经济原则的驱动下,人们在量化认知客体时,优先选择用身体属性或构造的具身认知去感知、体验具体或抽象事物的数量。为了使计量更为简洁明了,越来越多的身体名词被语法化为量词,用于计量事物。身体量词的数量不断增多,计量范围逐渐扩大,如“一头秀发”“一脸汗”“满眼泪水”“满嘴食物”“一鼻子灰”“一身新衣服”“一腿泥巴”“满手油污”等,此类身体量词的用法是计量附着在身体部位的具体事物。另一类用法是计量与其具有相关性或相似性的事物,如“一眉新月”“一口枯井”“一口锅”“一面镜子”等。还可用以计量相关情感、技艺等抽象事物,如“一脸无奈”“秀了一脸恩爱”“烧得一手好菜”“一拳儿好买卖”“一肩重担”“一身本领”“一头雾水”“满嘴脏话”“一肚子坏点子”“一腔热血”等。

在英语表量系统中,具身认知机制最为典型的是“a(n) + 身体名词 - ful + of”结构,如“a fistful of coins”“a handful of stones”“an armful of plants”“a mouthful of choppers”“an eyeful of tears”等,也可通过相似性特征的联想和类比建立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如“a coat of painting”“a flush of love”等。该类量词计量的范围也由具体事物的范畴逐渐扩展到抽象事物的范畴。用人的身体名词计量具体或抽象的认知对象,产生在真切中追求朦胧、为准确而诉诸模糊的效果,从而扩大认知解读中的信息量。

四、结语

在语言表达中,表量结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使用及其演变皆有据可依。个体量词是汉语所特有的,汉语属于典型的“量词型语言”,而英语则为“数标记型语言”;“量”与“数”的范畴标记在语言中是互补的,因此,英汉表量系统的繁简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本文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分析了英汉表量系统的异同。我们发现,转喻—隐喻连续体和具身认知这两种认知机制在表量结构的生成与理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结合为表量系统的理解和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欲求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 [1] Greenberg J. H. *Language Typology: 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 Overview* [M]. Hague: Mouton, 1974.
- [2] 李韧之. 类型学及其理论框架下的语言比较[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 (1).
- [3] 金立鑫. 语言类型学—当代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J]. 外国语, 2006 (5).
- [4] Croft, William.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 Aikhenvald, Alexandra. Y.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6] 张延成.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Second Edition) 导读[Online] [EB/OL]. <http://language.bokee.com/158735.html>.
- [7] 刘丹青.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03 (4).
- [8] 石毓智.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
- [9] 陈勇. A. E. Кириков 的语言类型学研究[J]. 当代语言学, 2007 (4).
- [10] 吴春相. 当代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研究方法[J]. 东疆学刊, 2009 (3).
- [11] 步连增. 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量词研究[D].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 [12] 尚新. 英汉名词的“数”与语言类型学特征[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 (1).
- [13] 朱晓军. 从“量词”英译看汉英量词系统对比[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 [14]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15]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6] Vyvyan Evans & Melanie Gr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7] 李勇忠, 白黎. 汉英新奇表量结构的认知修辞分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 (2).
- [18] 叶浩生. “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J]. 心理学报, 2014 (7).

(责任编辑: 舒娜)